

## N 本期聚焦

## 如何让撸起袖子的干部放开膀子干

人民论坛课题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这其中，“实干”是一个始终不变的主题，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改革发展各项事业的殷殷期望，同时也饱含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大事、议大事、干大事，坚决干、抓紧干、同心干的坚强决心、坚定信心。一时间，“撸起袖子加油干”燃遍了全国，广为传播。那么，如何才能真正“撸起袖子加油干”？人民论坛课题组就此搜集梳理了百余位专家学者、党政干部对于相关问题的观点和见解，同时，对广大公众展开了问卷调查，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

## 一、当前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与公众期待仍然存在差距，体制机制束缚或是重要原因

在调查中，我们让受访者对当前各级干部积极进取、敢于作为的情况作出评价，结果显示，仍有54.7%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干部的这种干事精神在不同程度上低于受访者的预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干事，又要能干事，还要会干事”。这句话深刻诠释了“干部干事”“为官有为”的真谛。尤其是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更应在干事和有为上作出表率。在调查中还可以看到，76.86%的受访者在不同程度上赞同“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显然，目前的状况与公众的广泛期待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调查中，问及“当前，影响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现实因素有哪些”时，55.36%的受访者认为是“体制机制束缚多”，54.50%的受访者认为是“晋升空间小”，49.88%的受访者认为是“工作压力大”，45.13%的受访者认为是“干事氛围不浓”，另外，还分别有39.62%、35.90%和27.51%的受访者认为是“理念、意识等跟不上”“收入待遇低”和“想干事但怕出错”。

专家认为，当前干部队伍社会心态的主流是好的，只有少数人主观呈现急功近利、盲目攀比、迷茫失落、不公平感等消极心态，特别是个别还存在一定程度“为官不为”的“懒政心态”。从客观上来说，我国的行政体制机制确实还存在改进的空间。一方面，要通过有效的经济



激励、政治激励、道德教育和法律约束等措施，来让干部干事创业“有劲头”；另一方面，要稳定基层干部队伍，制度创新是关键。有专家指出，要将“基层历练”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蓄水池”，要建立基层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机制，还要对基层干部实行“重奖严惩”的考核办法等等。

## 二、“撸起袖子加油干”，需要想干愿干，更需要能干敢干、会干巧干

为了使干部能够真正“撸起袖子加油干”，需要进一步加以提高或改善的是什么？通过调查发现，77.96%的受访者认为是“会干事的能力”，排在第一位；其次，73.71%的受访者认为是“敢干事的勇气”；另外，还分别有60.79%、43.87%的受访者分别认为是“想干事的热情”和“能干事的环境”。由此可见，公众更为关注的仍然是党员干部主观层面的干事能力和魄力。

“会干事的能力”即善为，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善做善成”。新常态下抓发展、攻坚中抓改革，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直接检验。有干部表示，光有干事的愿望远远不够，必须得有干事的能力和魄力。能干事，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边干边总结，理论联系实际，用正确的科学观、方法论来指导实际工作，勇于改革，善于创新，才能“善做善成”。而“敢干事的勇气”，则需要不断解放思想。思想解放的程度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干的事业就有多大。干事创业，需要那么一股子迎难而上、不怕失败的

狼劲和韧劲。对看准的事情，就要拿出超常的胆识和魄力，果敢地干、坚决地干。还有干部表示，领导干部在干事中敢不敢作为，体现的是胆识、气魄，诠释的是责任、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

专家也提出，综合能力是领导干部敢于担当的必要条件。一是善谋良策的能力。领导干部不仅要有学识，还要有见识胆识，谋一方发展必须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二是善带队伍的能力。要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上行下效，同心合力。三是善抓落实的能力。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决策也要执行落实，二者都需要有担当意识与能力。

## 三、使“撸起袖子加油干”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软硬兼施”“奖惩并举”

如何能够让“撸起袖子加油干”真正落地？通过调查，可以看到，受访者关注的要点均集中在“软件”和“硬件”两方面。调查发现，公众普遍认为真正落实“撸起袖子加油干”，更为重要的主要是“健全完善考核体系和奖惩制度”“加强办公场所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建立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各有61.37%、55.97%和53.56%的受访者选择。另外，还分别有48.57%、38.96%、34.91%和20.65%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做到“构建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营造和谐宽松的工作氛围”“培育充满人文关怀的组织文化”。总的来说，“撸起袖子加油干”真正落地，还需“软硬兼施”、“奖惩并举”。

“软硬兼施”，突破口在于体制机制创新。官员的担当实际上是个责任问题或问责问题，而责任或问责是存在于具体情境中的，体现的是一定制度环境下人的互动。有专家认为，公务员入职动机影响到公务员入职后工作的态度和行为，因此，首先要从公务员的人员选拔环节就以更为合理的机制实现把关，即选拔出那些认同公务员组织政治理念的人。只有认同中国政府公共组织的政治价值理念，才能有高质量的勤政行为。还有专家表示，建构成令与服从体系、统辖与分工体系、权力与责任体系，有利于强化组织管理中的责任意识和追责制度。

同时，要重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激励机制。从世界各国情况看，通过不断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福利等物质待遇，可以保证公职人员队伍的素质和稳定，激励公职人员安心为国家机关服务。因此，为保持干部队伍稳定，必须建立更为合理的、符合当前发展形势的工资待遇制度。另外，让同志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最好的机制之一是“容错”，但不是所有的错误都能包容，必须要保证所犯错误没有偏离方向，没有触碰底线。偶有失误可以免责，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关怀包容，向干事创业者传递鲜明的鼓励支持信号。

另外，很多党政干部还表示，“撸起袖子”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精神；既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行动。在“加油干”的行动中，领导干部带头，不仅要站位高、与发展同步，思路清、与改革同向，最重要的在于工作细、与群众同心。这是除了干事能力之外，党政干部在思想认知层面的“软”觉悟。

来源：人民论坛

## N 有此一说

## 以劳动原则为导向 重塑社会生活

陈立新

现代社会在其产生之际，就衍生了自我理解的实际要求。随着现实生活结构的成型与稳定，这一实际要求便转化为构建社会共识的一种推动力，进而发展为社会建制的动力元素，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意见走向。然而，正如很多思想家所洞察到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现象实情是进步与颓废并存，现代文明蕴涵着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这个时代的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马克思独具匠心地挑明，现代这个“文明时代”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

真正说来，现代生活变革的核心毋庸置疑是社会生活之根本原则的变更，亦即资本原则的退化。问题却在于，资本自始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柱；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资本始终能够展开自身外化自身，至今仍活力四射。这表明，在资本的现实作用包含着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资本仍是现代生活基本建制力量的情形下，我们今天对资本进行任何形式的批判，都不可能是让资本销声匿迹，而是要对资本的日常生活保持高度的敏感，恰如其分地划定并呈现资本有助于人类生活意义上的合法存在范围。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所以，社会生活原则的变更就是资本原则让位于劳动原则，按照劳动原则而不是资本原则组织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以劳动原则为导向，意味着人类生活性质的改变、人类新型文明开启。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现代文明，培育了“人的独立性”，实质上是“以物为本”；以劳动为原则导向的社会生活，实则弘扬“以人为本”。这是因为，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构成人的

本质以及人的现实存在。毋庸置疑，这是属于新型文明的生活图景。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这里言简意赅阐述了“自由”和“平等”得以产生的原始基础以及两者的相互依存性质。可以说，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现代文明培育了“人的独立性”，“自由”和“平等”正是“人的独立性”的基本构成或内涵。没有这种“独立性”，资本文明的“新时代”就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在于，资本原则的调控和刺激，“人的独立性”中的“自由”这一内涵得到了推动，但“平等”这一度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解困之策，首先要实现“自由”和“平等”各安其位、是其所是。当然，这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和担当。

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无疑需要在建构劳动为原则的现实运动中发现并执行自己的任务。这就面对资本与劳动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作用，需要充分吸收并合理发挥资本的作用。当务之急，是要推动劳动转化为自主的活动，促进劳动活力的充分迸发，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达到劳动对于资本的引领，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要求。

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成就，证明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为探索以人为本的新型文明做出贡献。当下中国社会所倡行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是贯彻以人为本的典范，是人类探索更美好社会制度的一种可贵的尝试。这对于人类开启新型的文明，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来源：福建日报

## 观点集粹

## 加强“微语言”治理刻不容缓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宋晖在《人民日报》刊文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使用的语言可以称为“微语言”。当前，“微语言”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并且呈现出“微”向“大”的发展趋势。“微语言”在给人们语言生活带来鲜活与清新感觉的同时，也带来“泥沙”与“污垢”，不少“微语言”呈现低俗化倾向，对人们尤其是少年儿童的语言学习带来负面影响。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既要适应并发展“微语言”，又要重视“微语言”治理工作。

加强“微语言”治理，应深入到“微语言”使用的平台。“微语言”主要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使用，因此，对其治理也必须深入到这些社交平台，采取有效的放

举措。从事网络信息技术服务的公司都应有“微语言”治理意识，不能为语言污染推波助澜。比如，汉字输入法、搜索引擎等都应设置过滤词表。各种社交平台的管理者更应高度重视语言污染问题，防止低俗语言肆意蔓延。把“微语言”使用的平台治理好了，“微语言”的语言污染问题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加强“微语言”治理，需要形成多方协同行动的格局。加强“微语言”治理，不仅需要国家进一步完善语言政策，需要相关机构运用不同工具和手段来规范语言的使用，还需要各相关主体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有关政府部门应在制度层面抓紧出台操作性强、易于落地的政策，网络社交平台的发展方、使用者也应从自身做起，努力防止语言污染。

## 电商监管要“换履适足”

全国政协委员、高级会计师石文先在《人民政协报》刊文提出，当前我国电商发展迅速，而监管机制与监管法规落后于电商发展实践，“脚”长大了，“鞋”还是原来的。是“削足适履”还是“换履适足”，答案毋庸置疑。“新鞋”如何换？为此，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建立符合电商发展实际的监管法律法规。

首先是打通电子商务监管法律体系。政府监管部门只能对发生在本行政区划内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理。电商无论商品产地还是交易、配送等多环节都存在跨境，因而一旦违法行为产生，监管部门也往往陷入“鞭长莫及”的尴尬境地。这就需要人大和政府尽快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权监管部门

建立一套法律支持的跨境监管体系，搭建起全国性的电子商务监管平台。

其次是建立商品质量责任共担机制。政府相关部门作为国家法律赋予的监管主体，在质量问题上应切实承担起责无旁贷的主体责任。电商平台作为交易主体双方的中间人和获益者，理应为自身商誉承担相应责任。对于在电商平台上销售的产品，电商平台应建立起综合性的考评机制和伪劣甄别机制，与政府监管部门建立起合理分摊的责任共担机制。

最后，要建立精通电商规则的专业监管队伍，并建立起工商、电信、公安、质检等政府多部门联动的电商执法体系。

## N 中外历史

## 合法性范式是中国历久弥新的智慧

张维为

西方社会一般认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选举，但这种认知面临两个挑战：其一，这种多党制下的普选制度历史很短，比方说，美国黑人是到了1965年才真正获得了选举权，人们是否可以质疑在此之前之前的美国政权不具有合法性。其二，这种制度只能在民族国家内实行，比方说，很难想像今天的欧盟能通过一人一票来获得合法性并发挥整合欧洲的作用。这两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对政权合法性的认知与西方认知的巨大差异。

##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政权合法性得益于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滋养

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型国家，即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叠合。这似乎有点像欧洲的古罗马帝国还没有灭亡，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内部包含了巨大的区域差别和文化差异，但同时又拥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现代经济、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使用数千种方言，但也使用统一的书面语言。这样的国家本质上是自己漫长历史上“百国之合”而形成的。一旦采用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将变得无法治理乃至解体，就像中华民国成立后采用了美式政治制度，结果导致了军阀混战，无数生灵涂炭。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政权合法性得益于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滋养。中国于公元前221年实现统一。中国今天所谓的“一党治理”对于许多西方人可能显得不具备合法性，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执政党承续中华文明，顺应历史趋势，代表人民利益，致力国家富强，必将实现民族复兴。实际上，过去两千多年里多数时间，中国一直实践着某种形式的“一党治理”，即由一个通过考试产生的统一儒家执政集团来负责国家治理。这种执政集团可能代表天下苍生，也可能只是自称代表了天下百姓，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多数时间内，中国是一个比同时代欧洲国家治理得更好的国家，它在多数时间内比欧洲国家更为和平与繁荣，这种情况大致延续到18世纪，后来由于自我封闭等原

因，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

## 中国坚持了自己政治领域内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探索和试验

中国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包含三个概念：首先，自汉朝以来形成的儒家“天命观”。孔子提醒中国统治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统治者必须勤政为民，实现良政善治，特别是维护天下太平与国家统一，改善民生，否则人民有权揭竿而起，以“天”的名义推翻政权。换言之，儒家的“天命观”并非上帝授予的权力，人民接受政权合法性的条件是统治者必须干得好。这种中国人的“契约论”比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契约论”早了两千多年。

其次，选贤任能的理念和实践。弗朗西斯·福山先生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曾说，“确实是中国人发明了现代官僚制度，即基于能力选拔出来的行政官员组成的永久性制度，而非基于亲缘关系或世袭继承的制度”。中国古代实行了选贤与能的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逐步确立了一整套选

贤任能的干部制度。

再者，中国治理哲学中的“民意”与“民心”观念。“民意”一般指公众舆论，“民心”则是指“人心向背”。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这个概念。“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更重要。在互联网时代，“民意”可能一夜之内就发生巨大变化，但“民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反映的应该是一个民族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执政者在多数情况下实行了“民心治国”。这使中国得以进行中、长期的规划，甚至为下一代的发展进行规划。

总之，西方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以普世价值的名义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但中国坚持了自己政治领域内的探索和试验。今天，我们的世界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其原因几乎都与西方如何界定政权合法性有直接关系。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沉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中国历史弥新的智慧和做法对于外部世界所能带来的启迪。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  
来源：北京日报